

詩

程
杰
著

北
宋
詩
文
革
新
研
究

詩

程杰 著

北宋



文革新研究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诗文革新研究/程杰著. -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0

ISBN 7 - 5311 - 3442 - X

I. 北… II. 程… III. ①古典诗歌 - 文学研究 - 北宋②散文 - 文学研究 - 北宋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3528 号

北宋诗文革新研究

著 者:程 杰

责任编辑:王占荣

装帧设计:王引之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西护城河巷 30 号 邮政编码:010010)

内蒙古瑞德教育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25

200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 100 册

ISBN7 - 5311 - 3442 - X/I·173

定 价:30.00 元

序

程杰同志的学术专著《北宋诗文革新研究》，是得到学术界专家们一致赞誉的博士学位论文，现在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向社会发行，定将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很大影响，作为他的导师，我深感欣慰。

程杰同志 1982 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即师从本系金启华教授攻读唐宋文学硕士学位，后来留在本系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程杰同志为人谦和敦朴，为学勤奋努力，在道德品质和钻研学问两个方面都为校内外同仁所称许。数年间发表论文数十篇，并有两部著作问世。然其并不满足现状，渴望继续深造，于是在 1991 年又报考博士研究生，随我攻读唐宋文学博士学位。三年中他以惊人的毅力，孜孜矻矻，兢兢业业，用一年半时间，边教学边完成了六门学位课程的学习，考核成绩优秀。又用一年半的时间，边教学边完成了这部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在繁重的教学任务重压下攻读博士学位，并在教学和学业两方面都获得优异成绩，这实在是非常不易的。

“北宋诗文革新”是宋代文学研究中的老课题，前人多有论述，所以程杰同志以此作为学位论文选题时，我曾担心不易突破前人的旧框框。但当他向我阐述总体构想时，我惊喜地发现他已全面而深入地通读了北宋的别集、史书等各种典籍，具体地梳理出了一个崭新而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大大超越了前人的窠臼，这使我放心地鼓励他认真写成一部宋代文学研究的力作。

程杰同志如期完成了学位论文的写作，我随即将他的论文分

别寄请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南京大学卞孝萱先生等专家予以评议,专家们都给予极高评价。1994年5月,由七位专家组成的、以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举行了程杰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程杰同志的答辩又使答辩委员们大为赞赏,一致通过并给出了充分肯定其学术价值的评语。6月,校学位委员会一致同意授予程杰同志博士学位。

程杰同志博士论文的主要学术价值在于:

一、它首次对“北宋诗文革新”这一宋代文学的重要课题作了全面、具体而深入的探讨,开拓了许多前人论述中尚未涉及的领域。整个论文分三部分:上编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方面,论述北宋诗文的各文学流派、文人群体对文学革新的作用,中编从专题研究的横向方面,分别论述诗文革新中艺术价值观、艺术内容和形式等问题,下编集中探讨宋诗审美意识的结构和内涵。这样的构思和安排体现出较为阔大的学术视野,又利于“北宋诗文革新”这一重大课题的正确把握。诚如王水照先生在论文评议书中所说,“既便于清理诗文革新的全过程,又便于深入探讨某些重大的理论课题,达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二、作者在前人今人的研究基础上,锐意求新,无论是全局还是细节,都有不少新发明、新见解,还提供了许多新材料,作出了许多新论述。如第一章对宋初三朝文风的梳理,作者结合政治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变化过程,论述了宋初文风在总体沿袭状态中的潜在演进趋势。第二章提出了“后西昆体”这一全新的概念,并作了详细的论述。第四章关于京东士人群体的考论,新意尤为突出。学界确认,仁宗朝以来的复古革新力量分为两派:一是以欧、苏、梅为代表的“重文派”;一是以石介、孙复为代表的“重道派”。从地域分布来看,前者以河南洛阳为中心,后者以山东泰山为中心。而程杰同志根据颜太初《东州逸党诗》等材料,考证出山东境内“东州逸党”的存在,并大致勾勒了其活动情况,论述了他们统属于京东士

人群体而与石介礼法之士又相对立的性格特点,以及他们对于诗歌革新的贡献。这些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可补文学史之所遗。在大量有关诗文流派和文人群体的论述中,程杰同志特别注意地域文化背景的考察,并用专章对整个北宋文学不断发展新变的地域性因素作了集中论述,认为北宋诗文革新的不同流派有着不同的地域性文化背景和民风基础,这些地域性因素决定了他们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的特殊性,江南、京东河北、江西淮南和巴蜀士人的依次出现,标示着北宋诗文创作前进的步伐,推动着诗文革新的不断演进发展。这些论点,视角新颖,论据翔实。宋代诗文的一些老话题,虽然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经程杰深入挖掘,辩证立论,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启发。如关于宋诗“平淡”美的论述,既具体地勾勒了宋诗“平淡美”理念形成发展的过程,又阐明宋诗“平淡”美的具体内涵。又如对宋代诗文“乐”主题的讨论,虽然类似的提法有人发之于先,然作者深入探讨,精心阐发,勾勒出了乐观情调在整个北宋诗文中的发展变化过程,并对其艺术表现、社会基础以及文学史价值作出了全面的分析和评价。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脍炙人口,其思想和艺术价值早有定评,而程杰同志则引述滕子京《岳阳楼诗集序》、《求记书》等材料,搞清了《记》中有关观点内容的具体针对性,使我们对这一名篇的创作背景和思想内容有了更切实的了解。整个论文中类似的新见和发明还有很多。

三、论文既有宏观把握的开阔视野,更有细致入微的个案分析,新观点、新见解多建立在事实分析的基础之上,反映出作者学风的严谨和功底的扎实。比如第十五章关于艺术形式的分析,以统计图表说明不同时代不同作家之间文体使用的特点及其变化情况。再如第七章对梅尧臣不同创作阶段诗歌体式使用情况的统计分析。这些统计分析使艺术风格的研究避免了笼统的描述,而做到了实证的、具体的说明。从论文中还可以看出,程杰同志对北宋诗文革新这一长时段“过程”的讨论,是以全面的编年工作为立论

基础的。论文中关于士人群体、代表性作家的重要活动,论文中引用的重要作品大都标注年代,这就比以往有关论著模糊地说“宋初”、“北宋中期”等更为准确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实节奏,使整个论文具有了鲜明的“史”的品质。

总而言之,程杰同志经过艰辛的劳动,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余感其志,爱其成,介绍其为人为学情况,并櫟栝诸先生评语,聊为序。

郁贤皓

1996年4月11日于金陵陶谷新村

目 录

序	郁贤皓(1)
导 论	(1)

- 一、北宋诗文革新的历史背景
- 二、北宋诗文革新的精神方向
- 三、北宋诗文革新的发展特点

上 编

第一章 宋初三朝的崇文风气与文风的演进	(23)
---------------------------	------

- 一、太祖太宗朝的崇文之风与“敏赡”文风
- 二、真宗朝崇文风气的新变
- 三、崇德归儒思想的确立及其对文风的影响

第二章 从“西昆体”到“后西昆体”	(39)
-------------------------	------

- 一、“西昆体”之受裁阻
- 二、晏殊的闲雅娱适诗风
- 三、“二宋”诗风内涵的拓展

第三章 柳、田、张、王与诗文革新意识的发生	(51)
-----------------------------	------

- 一、柳开：儒学之士的学古与开道
- 二、田锡：从“文藻”到“名节”的自觉
- 三、张咏：豪士的忧济之心与气节自饬
- 四、王禹偁：讽谕之义与古文传统的全面倡导

第四章 北宋京东士人群体及其诗文革新实践	(68)
----------------------------	------

- 一、京东士人的活跃状况
- 二、石介：道德之士的文化传统和实践风采

三、“东州逸党”与宋诗“慷慨悲歌”之音的昙花一现	
第五章 范仲淹:儒者道德情操与传统文士情趣的融摄	(92)
一、圣贤开济之志与仁者忧乐之情	
二、道德清味与山水之乐	
第六章 欧阳修文人集团与宋代诗文新貌的形成(上)	(106)
——苏舜钦的人格与诗文风格	
一、欧阳修文人集团的特征	
二、苏舜钦的人格与诗文风格	
第七章 欧阳修文人集团与宋代诗文新貌的形成(中)	(128)
——梅尧臣的诗歌创作	
一、梅尧臣的生平特征与诗学主张	
二、梅诗内容和艺术的基本特征	
三、梅诗风格的“平淡”	
第八章 欧阳修文人集团与宋代诗文新貌的形成(下)	(157)
——欧阳修的文化人格与文学实践	
一、“履之以身”、“施之于事”与“见于文章” ✓	
二、“达老”、“醉翁”与“六一居士”	
三、“感慨”、“豪宕”与“悦愉”	
第九章 王安石、曾巩等淮南、江西文人与诗文革新的深化	(186)
一、江淮以南士风的新变	
二、王安石、曾巩的文学思想与古文创作 ✓	
三、王安石的诗歌理论与创作	
第十章 蜀中来风与诗文革新的新阶段	(209)
一、蜀中来风	
二、“三苏”的社会化过程	
三、苏轼思想性格的意义与魅力	
四、“三苏”的文学思想 ✓	
五、通脱透彻、有容乃大——苏轼“集大成”说	

中 编

- 第十一章 北宋诗文革新的地域性因素 (250)
- 一、宋初南方士人与晚唐五代文风的继承
 - 二、文学复古意识兴起于京东、河北
 - 三、南北士风的交流与政治改革高潮后文学重心的南移
 - 四、蜀中来风与诗文革新的新阶段
- 第十二章 北宋诗文革新中文学价值观的嬗变 (270)
- 一、文学与道学
 - 二、文学与政治
 - 三、文学价值观的新意
- 第十三章 北宋诗文革新中“乐”主题的发展 (307)
- 一、“文藻相乐于升平”
 - 二、“悲”的超越与“乐”的规范
 - 三、“乐”主题的人格本体深化
 - 四、“乐”主题的艺术表现形态
 - 五、“乐”主题发展的历史基础和价值
- 第十四章 北宋诗文革新中观物体物心理的变化与发展 (336)
- 一、即物究理
 - 二、寓物为乐
 - 三、离形得似
- 第十五章 北宋诗文革新中艺术形式的拓变 (366)
- 一、平易自然——一个风格的基本原则
 - 二、突破——体式创新之一
 - 三、融合——体式创新之二
 - 四、泛化——体式创新之三

下 编

- 第十六章 宋诗“气格”美的理论和实践 (403)

一、欧、苏、梅的“气格”之求	
二、“气格”的推扩与趋变	
三、“气格”内敛而为“意格”	
四、“气格”美的内涵特征	
第十七章 宋诗“平淡”美的理论和实践	(417)
一、欧、梅的“古淡”论	
二、“平淡”诗论的深化	
三、“平淡”美意识的普遍性	
四、“平淡”美的内涵规定	
第十八章 宋诗“活法”美的理论和实践	(432)
一、诗禅新关系	
二、苏、黄诗风与禅门宗风	
三、诗歌“活法”的正式提出	
四、南宋诗歌“活法”流行的基础	
五、诗学“活法”与理学“活法”	
六、“活法”诗的典范	
七、诗歌“活法”的价值意义	
第十九章 宋诗创作意识中的三大矛盾关系	(458)
一、“情”与“理”的关系	
二、“意”与“法”的关系	
三、“雅”与“俗”的关系	
第二十章 陶、杜典范意义的发现与宋诗审美意识的形成	(483)
一、对杜甫的发现	
二、对陶渊明的发现	
三、陶、杜典范的确立与宋诗审美意识的完成	
征引书目	(499)
后 记	(511)

导 论

本文讨论“北宋诗文革新”，不采用“运动”即“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概念。因为现代文艺理论中“运动”的概念是建立在近代以来西方文艺实践基础上的，它倾向于指那些“一群趣味相同的人有意识的，在多数情况下有理论指导的，旨在说明艺术的一种新概念的努力”，“它大体上是一批同代人的努力”[1]。也就是说，“运动”不像“时期”、“流派”那样可以是一个长时段的概念，它一般用来指称那些在一定纲领指引下“一批同代人的努力”与行动。而“北宋诗文革新”，作为一个新的朝代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升与发展条件下文学上的起衰复兴与变化转型，更倾向于是“一个过程”。其中虽然不乏激烈的“运动”和“革命”的行动——它们显示了历史步伐的矫健有力，构成了所谓“诗文革新”最突出的标志，但从整体看，文学的兴衰转盛尤其是实现精神风格的转换建构，有赖于几代人多方面的、持续不断的努力，是一个充满着各种矛盾斗争，包含着“革命”与“维新”、“通变”与“新变”等多种革新、发展方式的辩证运动过程。我们从这个意义上使用“北宋诗文革新”的概念，同样也以这样的视角进行审视观照。

一、北宋诗文革新的历史背景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2]。北宋诗文革新也是在北宋经济生产、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出现了一

系列变化的广阔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赵宋为李唐之后又一统一王朝,统一的政治局面和相对安定的环境,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宋朝历太祖、太宗三十余年,至真宗朝即趋升平。张耒《咸平县丞厅醕醑记》云:“自开元以来,至于章圣(宋真宗),而天下之人始复见大治之全国。”(《张耒集》卷四十九)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继之,虽因革不一,间有边事,要亦为有宋之盛时。整个宋代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农业上耕地面积增加,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得到改进,一年两熟和两年三熟制的面积日趋扩大,占城旱稻等优良品种普遍推广,经济作物的种植逐渐区域化,各种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手工业也得到发展。行业规模扩大,分工细密,生产技术和产品数量、质量都有所提高。冶金、纺织、造纸、印刷业的生产力都居当时世界领先水平。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商业的兴旺发达。宋朝统治者稍稍放松了对商业的抑制,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城镇化进程加剧,全国商税额激增。户口的增加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宋代人口比汉唐增加一倍多,最高时超过一亿。国家财政收入较之前代大幅度增加,宋太宗时“国家岁入财赋,两倍于唐室”〔3〕,到南宋时更是“十倍于汉,五倍于唐”〔4〕。有史学家指出:“多年来,人们总把宋代看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甚至有人认为汉唐时经济比较发展,到宋代就出现了‘停滞’的趋势。其实,积贫积弱只是表面现象,它只反映了宋代国家财政的不敷出和对外关系上的软弱无能,从整个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看,它要比汉唐富裕得多。”〔5〕这个结论,目前已经得到宋史和宋代文学研究界的广泛承认。正是在这相对富裕的物质条件下,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才得以全面活跃和持续发展,文学才得以展开历史性的革故鼎新过程。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但它同时又

与社会生产关系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富裕，既是宋代社会结构变化发展的最终动力，又是唐宋之际社会各阶级关系变化的结果，它们共同构成了宋代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基础”。从中唐开始，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政治体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迁。以杨炎两税法的财政改革为法律标志，土地国有制——“均田制”崩解，庶族地主经济和小自耕农经济开始迅速发展。经过唐末五代农民起义和长期分裂动乱，门阀士族遭到沉重的打击，庶族地主阶级走向历史舞台。与门阀士族统治下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体制不同，入宋以后土地私有制的普遍发展和雇佣关系的出现，使较为广大的社会阶层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官户”、“形势户”即官僚地主代替了门阀士族，佃客代替了部曲和奴客，雇匠、兵匠等各类“良民”代替了贱民，整个社会基本上形成了官僚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手工业工人及城镇平民为主要成份的阶级结构。与上述庶族地主经济大发展和阶级关系大变化相适应，宋朝政治从一开始就明确了一些新的建设方向。为了防范各种分裂割据因素，中央极端专制集权，进一步扩大科举制度，完善考选程式，革除隋唐时期少数权贵操纵舞弊，“科名多为势家所取”〔6〕的弊端，使科举真正面向社会，成为网罗统治人才，巩固封建政权的有力措施。以科举制度为纽带，逐步形成了皇族、封建官僚和地主阶级三位一体的统治体系。

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官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即通常所谓“士大夫”无疑是最重要的阶层，作为统治阶级的主干，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尤其是在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与以前的门阀贵族不同，宋代“士大夫”大多出身贫贱，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天才和努力，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官职。他们来自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处于不断的升沉流动之中，拥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庞大的人员队伍。作为门阀士族衰落之后的递补力量，虽然无复以往衣冠贵族的世袭特权，但他们以阶层的力量被赋

予了与皇家“共治天下”的地位，享有广大庶族文人前所未有的“宠章殊遇”。

历史地位与历史使命是有机统一的。历史在把广大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推向社会前台的同时，同时交付了一系列社会课题。中唐以来摆在广大士大夫面前的根本课题是，在门阀政治体系逐渐衰落崩溃之后，如何挽阻社会衰势，重建政治秩序，再造治平盛世，并保其长治久安。对于宋代士大夫来说，这一课题有着先天的沉重性。五代的长期战乱使中原地区力量大为衰落，而周边契丹与党项羌人相继崛起，宋王朝虽重建帝国“一统”，但无复汉唐之“大”，并且一直为北方少数民族势力所困扰，不得不赔款输绢，苟求和平与安宁。中央高度专制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又有着与生俱来的保守性和腐朽性。宋王朝强干弱枝、抑武佑文等立国政策在强化内部统治，缓解内部矛盾的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外向抗击的能力。同时这些政策不可避免地引发“冗兵”、“冗员”问题，给宋王朝带来了积重难返的社会危机。一系列反拨门阀政治而产生的统治措施在经过一段时期运转后暴露了明显的弊病，宋王朝处于亟待疗救的境况之中。仁宗朝初年是北宋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重要转折点。从那时起，围绕是否改革和如何改革的问题，士大夫阶层不断分化组合，改革派与保守派，不同的改革力量及不同的保守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此起彼伏。这些矛盾冲突的形成和激化固然是官僚政治机制相对于门阀政治体系所特有的活力，同时也暴露了其相互牵制、机体内耗的既定痼疾。以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为代表的进步政治家向保守的政治势力，向腐败的政治现象乃至祖宗确立的成规“家法”发出挑战，谋求政治的清明、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富强，相继领导了“庆历新政”、“熙宁变法”两次大规模的政治改革运动，代表了苟安保守、衰微僵化的社会里最为积极向上的一面。

与政治上的改革辅应而行的是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复古与开新。从中唐开始，以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为代表的进步知

识分子感激于“安史之乱”后社会的长期衰危动乱，满怀忧患而志在经世，在痛心疾首之际反思历史文化的运作、宇宙社会的秩序以及人生存在的意义，萌发了以古儒先圣道德理性精神振奋世俗人心，重建社会秩序的思想。这一课题为宋代社会所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变动和发展。宋代社会对政治秩序和人伦道德的建设提出了更为强烈的要求：

（一）中央专制集权的加强决定了对意识形态乃至整个世俗人心规范和统制的强化。宋王朝在“强干弱枝”、“抑武佑文”等一系列铲除分裂割据因素的立国政策取得成效之后，就把主要注意力移到士人队伍和广大民众思想与行为的制约、规范和教育方面。尤其是士大夫队伍，作为门阀力量的递补，是中央集权的直接基础。如何对这庞大的阶层和机构有效地制约调度，保证其忠实、有效地运转，是巩固封建统治的关键所在。封建最高统治者一直把对士风的戒飭、对“朋党”的防范、对士大夫内部利益的平衡调整放在重要位置，其目的是不断加强统治，维护中央集权。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士人的精神世界、行为作风不得不有所节制。汉唐之际士人那种慷慨激越的事功意识，门阀士族影响下的那些通脱佻达的名士风流与浪漫作派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批判，广大士人作为官僚政治制度的“个中人”越来越受到身份的“拘检”，思想自由也必然受到无形的限定，理论命题自觉不自觉地顺应政治的需要，集中关注帝国的一统尊严、社会的伦理秩序和人生的道德义务。

（二）建立在庶族地主和小自耕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平民化的社会结构更需要伦理的维系和道德的温润。六朝时期门阀社会的构成崇尚“实力”原则，地方的、宗族的、军事的集团势力的起伏消长决定了江山的归属、朝代的更替。而到宋代，这些“实力”集团被彻底铲除，取得独立地位的广大阶层、群体、编户处于分散的状态之中，他们之间的社会结构实际上存在着更多相互依存的复杂因素，需要有力的“秩序”原则加以维系。最高统治者、封建士大夫、地主

阶级和农民、城镇手工业工人等劳动阶级之间平衡结构的持久稳定需要各阶级、各阶层的按部就班、安分守己。特别是士大夫地主阶级,作为社会的中坚,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肩负着维护中央集权,调度广大民众的使命,对国计民生有着全局的责任。作为最广大的既得利益者,更有理由高举社会“秩序”的旗帜,维护社会的和平稳定。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作用,宋代思想文化领域以政治秩序、伦理道德的建设为主要课题。广大的官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从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进而维护阶层自身利益出发,深入思考宇宙社会的秩序、历史文化的运作和生命存在的意义,藉着理性的反省,树立道德的自觉,培育社会的良知,拓展人间的关爱。宋代的学者普遍追求一个可以面对宇宙人生、国家社会、人世出世各方面曲畅旁通、正大圆融的原则,这就是所谓“道”或“理”。从宋初开始,“复古明道”的思潮不断深入,其目的就是以儒为本,融会佛老,建立一个既安顿国计民生,又安顿自我人生,既安顿社会家园,又安顿精神天地的原则道理。不仅是柳开、孙复、石介、胡瑗、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由古文、经学进而理学的发展,“道”的大旗愈举愈高;而且田锡、张咏、王禹偁、寇准、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相继兴起的改革之流也以“道”的探索为灵魂,为基石。一部分人注重切实明道,通经致用;一部分人注重正本清源,修身立极,两个方面都统一在封建秩序的建设和道德人生的追求之中。

正如前面所反复强调的,宋代社会的伦理秩序和道德精神建设的关键在宋代士大夫阶层自身。“冗员”弥费、苟安积弱以及土地兼并等困扰宋代社会的问题都与士大夫直接有关或由士大夫作俑成祟。庞大的官僚机构日趋尾大不掉,其内部各种利益关系歧路纷纭,各种矛盾斗争错综复杂,导致了阶层结构的涣散。新兴的市井社会不断地带来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加剧了士人精神信念的危机。如何使来自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广大士人不仅